

## 金融全球化与墨西哥的金融安全

· 吕宇斐

**内容提要** 金融全球化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战略,它对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杀伤力,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巨大的危险性。2008年,由美国次贷市场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泡沫蔓延全球,墨西哥也难逃厄运。墨西哥在最近的福克斯和卡尔德龙两届政府时期,其金融体系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安全完全掌握在西方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手里。当西方国家在反思金融全球化的危害时,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反思金融全球化对本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金融全球化 金融危机 墨西哥 金融安全

### 一 金融全球化意味着西方主导全球金融秩序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几乎横扫全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1982年危机在拉美首演,然后陆续蔓延至东欧、东南亚和东亚。到20世纪初的2002年,危机又回到拉美,这场危机暂告一个阶段。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则在孕育之中。这场历时20年、深刻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西方跨国企业可以在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和市场“自由化”中扩大垄断区域,进而扩大垄断规模。与以往不同的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以金融全球化的面目出现的,这意味着西方跨国财团的巨额资本可以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任意流动,以在全球范围内掠夺更大的利益。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金融全球化”观点主要有4种:核心论、趋势论、过程论和一体化论。按照时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比较流行的定义,金融全球化可以解释为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突破国界和民族国家的限制,以普遍接受的金融资本领域的原则为基础,平等互利地进行金融资本的交往。这一定义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当前全球化固有的矛盾。

首先,当今世界金融领域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

等现象。当前的金融领域的运行规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跨国金融寡头、国际金融机构等制定的,这是一场既充当比赛选手又担任比赛裁判的一场资本实力的竞争。那些缺乏资本的国家,其金融主权将逐渐被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寡头所削弱和控制。

其次,由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强行推广的一套国际金融规则并不被各国普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它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参与这种没有话语权的金融全球化;要么不接受,结果是经济上特别是金融方面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被排除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之外。简单地说,从国家贸易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或欧元,就可以知道金融全球化意味着整个系统是由美元和欧元构建的,美元和欧元创始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没有话语权。

因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其实质是由西方资本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即由控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跨国金融寡头和金融机构为了维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主导地位而极力倡导的一种“世界潮流”。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这场资本大潮中必然永久处于劣势,资本及其利润的流向永远都是单向的。

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对金融危机也不具备特别强大的“免疫”功能,同时由于其内部运转存在的严重矛盾,当危机到来时,其经济也显得非常脆弱,2008年从美国开始蔓延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因为主权基金的出现,当前国际资本市场上产生了某些西方社会意料之外的大规模资本流动。笔者认为,金融全

收稿日期:2009-09-28

作者简介:吕宇斐,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美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100007)

球化进程在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有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欠发达国家身不由己,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全球利益,也会根据全球形势改变其全球化的战略。

据2007年6月21日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报道,美国参议员吉姆·韦布致信美国财长保尔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切尔托夫,称中国购买美国黑石集团股票可能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要求黑石集团推迟上市。无独有偶,欧盟委员会2007年9月19日公布了一份限制非欧盟国家投资欧盟能源领域的文件。欧盟委员会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甚至禁止非欧盟国家收购欧盟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网。欧盟只会同意那些愿意向其开放能源市场的非欧盟国家收购欧盟的能源和电力资产。这些言论和措施完全违背了西方国家鼓吹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准则。所以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美国正逐渐“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发现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多了,有可能像西方那样向全球尤其西方资本市场投资并获取利润。

## 二 墨西哥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改革忽视了本国的金融安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亚历杭德罗·阿尔瓦雷斯·贝哈尔教授认为,金融自由化隐藏着引发巨大危机的危险,而且国际社会没有提供获取经济援助、避免经济动荡的国际机制;金融全球化说明所有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纰漏;流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只占世界流通资本的很小一部分,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调节能力,自由进出的资本将制造深刻的经济动荡;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复苏”成本,使绝大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实际上进展极其有限,即使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sup>①</sup>

墨西哥进行的经济和金融改革,是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由外国金融机构主导一个欠发达国家政府完成金融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这项改革的正面效应是美国帮助墨西哥政府暂时渡过了还贷危机;<sup>②</sup>负面效应是墨西哥政府迫于形势,在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强行主导”下进行了代价巨大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其代价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短时间内完全开放外国投资,由美国控制本国石油

销售和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通过改革,墨西哥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美国倡导的金融全球化。<sup>③</sup>

1982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美国对其实施的援助计划有3项附加条件。一是以墨西哥石油期货还预期贷款。这项条款出现的原因是美国石油战略储备接近枯竭,而且向墨西哥索取的石油,其价值相当于市场价值的2倍。二是墨西哥必须开放农业部门,进口美国玉米。原因是墨西哥农业部需要紧急贷款援助,所以只能以牺牲本国的玉米产业为代价。三是墨西哥必须实施一套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美国财政部、IMF为了按期获得对墨西哥贷款的本息,需要墨西哥政府实施极其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sup>④</sup>。此外,美国还通过实施“布雷迪计划”,使墨西哥政府开放金融部门,并进行了3项金融改革:取消国家对银行利息的管制,改变外商投资的法规和对外资开放股市。<sup>⑤</sup>到1990年,萨利纳斯政府还对外资开放国债市场,取消了政府证券投资方面对外资的限制。<sup>⑥</sup>

1994~1995年墨西哥发生了第二次、也是更为深刻的一场金融危机。美国再次实施援助计划,这一援助计划动用了比1982年援助计划更多的资源。<sup>⑦</sup>而墨西哥也付出了比1982年更大的代价:不仅要继续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还要负担所有

① Alejandro Alvarez Béjar, *La Inestabilidad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y Sus Implicaciones en México, Globalización Financiera e Integración Monetaria*, primera edición, México D.F., UNAM, Enero de 2002, p. 350.

② Nora Lustig, “Los Estados Unidos al Rescate: La Asistencia Financiera a México en 1982 y 1995”, en *Revista de CEPAL*, No. 61, Abril de 1997, p. 45.

③ Alejandro Alvarez Béjar, *La Inestabilidad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y Sus Implicaciones en México, Globalización Financiera e Integración Monetaria*, primera edición, México D.F., UNAM, Enero de 2002, p. 111.

④ Nora Lustig, “Los Estados Unidos al Rescate: La Asistencia Financiera a México en 1982 y 1995”, en *Revista de CEPAL*, No. 61, Setiembre de 1983, p. 62.

⑤ Ian Vázquez, “The Brady Plan and Market-based Solution to Debt Crisis”, in *Cato Journal*, Vol. 16, No. 2, Fall 1996.

⑥ Jaime Ros, Nora Lustig, “Trade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with Volatile Capital Inflows: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Social Impacts in México during the 1990s”,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New School University, *SCEPA Working Paper Series I*, No. 18, February 2000.

⑦ Nora Lustig, “Los Estados Unidos al Rescate: La Asistencia Financiera a México en 1982 y 1995”, en *Revista de CEPAL*, No. 61, Setiembre de 1983, p. 51.

的调研费用；墨西哥的石油收入必须先通过纽约美联储设立的账户扣除贷款本息；墨西哥政府必须完全公开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的战略资源绝密档案，这是令墨西哥人感到最耻辱的不平等条款。所以贝哈尔教授在谈到这个援助计划时说，“我们（墨西哥人）不仅没有感激之情，而且恰恰相反。”其原因是，IMF 和世界银行对墨西哥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美国对墨西哥各个领域开放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认为，“金融动荡和对外开放是同步的。”<sup>①</sup>

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实施的援助计划只不过是债务推迟以解燃眉之急，并非为了解决墨西哥金融体系的深层问题，结果造成墨西哥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由 31.4% 增至 43.3%。墨西哥在 1995 ~ 1996 年为救市向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所借的债务于 2005 ~ 2006 年到期，但 10 年来运行在低谷的宏观经济使紧缩的财政开支负担有增无减。为偿还欠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 1994 年实施“援助计划”时留下的债务，墨西哥政府在 2000 年 3 月 1 日发行 720 亿公债进行融资，以缓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这是一种寅吃卯粮的方法。<sup>②</sup>

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先后两次从金融危机中“援助”墨西哥，有其深远的战略意图，笔者完全理解美国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美国的战略意图有两个：首先，在 GTAA 或 WTO 成员国面前树立达到美国或者西方要求的自由贸易的样板，通过墨西哥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说明要进入美国和西欧这两个全球最大市场的资格要求；其次，在 GTAA 或 WTO 成员国面前树立一个优秀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样板，通过它向全世界推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的”自由贸易经济模式。

美国的策略非常成功，它不仅使墨西哥最大程度地丧失经济和金融自主权，成为融入美国这个完全主导型经济体的一个依附型经济体，也使全球各国政界和经济界中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国际精英纷纷追捧这个理想模式，以致 GTAA 乌拉圭回合谈判乃至 WTO 的某些条款几乎全部照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金融全球化。所以在随后的 WTO “千年谈判”中，开放服务业领域就成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崇的条款。现代服务业分为 4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个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

括金融业、保险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个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研事业、生活福利事业等；第四个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sup>③</sup>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如此推崇服务业全球化，原因在于它们在各个层次的服务业领域对欠发达国家都有很大的优势，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更是如此，特别是在银行、保险、电信、证券、法律等领域更具压倒性优势。只要开放服务业市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机构将势如破竹地控制欠发达国家的各个服务领域。

经过两次金融危机，墨西哥的金融体系首先实现了国内的私有化；之后被美国为首的西方跨国银行逐步完成并购，实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改造。自此，墨西哥银行体系完全外资化，其结果是银行系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银行系统完全脱离了欠发达国家银行应该充当国家发展建设的支持者的角色，转而充当鼓励社会、个人消费的角色。银行贷款在国家基础建设、重点工程等生产建设领域的利率居高不下，贷款额迅速下降，而在消费服务业和个人消费信贷领域却较低，贷款额迅速增长。

根据墨西哥央行提供的国内贷款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墨西哥企业贷款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50% 降至 2005 年的 25%，而非银行融资的企业贷款比重则从 1995 年的 50% 大幅上涨至 2005 年的 75%。<sup>④</sup>这说明，墨西哥银行系统与正常的国家商业银行系统应起的三大作用基本背离，也与福克斯政府在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里要求实现的目标完全背离。与企业生产性贷款大幅下降相反，一般消费贷款占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

<sup>①</sup> Alejandro Alvarez Béjar, *La Inestabilidad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y Sus Implicaciones en México, Globalización Financiera e Integración Monetaria*, primera edición, México D.F., UNAM, Enero de 2002, p. 379.

<sup>②</sup> Armando Labra Manjarrez, Héctor Ramírez Del Razo, “Diez Mitos No Generales sobre el Fobaproa, en la Problemática Financiera, la Banca Central y la Protección del Ahorro Bancario”, en *Cuadernos de la AMEP*, No. 4, 1999.

<sup>③</sup> 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1985 年。  
<http://gaige.rednet.cn/c/2008/04/14/1483741.htm>

<sup>④</sup> Gustavo Vargas Sanchez, *Análisis Económico de un Sexenio que Está por Concluir*, primera edición, Editorial Castedel S. A. de C. V., 2006, p. 102.

比重大幅上升。1996年，普通消费贷款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仅占5%；2005年，这一比重竟大幅升至30%<sup>①</sup>。如此融入金融全球化，对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sup>②</sup>

美国在WTO“千年回合”谈判前，曾经试图拆散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作为“千年回合”服务业谈判的王牌。贝哈尔教授说：“如果人为的长期压制拉美最大、最重要的公立大学都搞垮了，那么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也将在产业化的压力下像纸糊的城堡那样轰然倒下。”<sup>③</sup>在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严格要求下，墨西哥的紧缩财政政策延续了25年之久，宏观经济表现得比较稳定，但国家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支出也大幅减少，严重伤害了墨西哥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系统，更严重破坏了福利国家的基础。这也是墨西哥在金融全球化中的代价。

近20多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拉美、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已经向所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新兴工业国家证明，经济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接受的开放程度是不同的。要避免频繁的、深刻的金融危机，一方面必须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健全国内金融机构、金融体制和金融法规；另一方面要保证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必须避免过早、过度地向跨国财团、国际游资开放。

### 三 世界性金融危机敲响了墨西哥金融改革的警钟

近20年来，在空前的全球化浪潮中，拥抱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光彩夺目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国家首脑、主流经济学家、金融大资本的代言人济济一堂，分享他们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技术正在改良世界，使资本主义世界无限繁荣发展的极度乐观主义精神。在2001年美国信息科技泡沫破裂首次引起西方金融资本制造的衰退时，聚集在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精英们依然相信，那些深刻的问题只会造成暂时的经济减速。

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令2009年初参加论坛的精英都感觉到经济形势寒气袭人。这次论坛中，全球精英达成的共识是，会议召开时IMF对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预测过度乐观。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长率一

度跌至一战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届达沃斯论坛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反思，也可视作对墨西哥政府20多年来执行的经济政策进行的间接批评。

第一，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会者对主导了全球化浪潮30年的自由市场终于失去了信心。与会精英都认为：“相信市场可以自我校正”这项经济政策要为这次危机负责。<sup>④</sup>他们指责的正是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市场万能”论。<sup>⑤</sup>当这个基础失去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了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大厦。

同样遭到批判的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有：（1）“有效市场”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价格可以完全并且有效地反映一切信息。（2）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个目标制对通货膨胀“过度关注”，削弱了对金融稳定性等更根本的问题的关注。现在，各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普遍认为：控制下的通货膨胀是有必要的，理应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和繁荣。该观点是对自德拉马德里政府至福克斯政府在墨西哥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严格执行的彻底市场化和严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第一项批评。

第二，近30年来，在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浪潮中，IMF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扮演了西方金融资本助手的角色。该机构迫使大多数向它求助的欠发达国家提高利率、取消汇率管制、降低消费、削减福利，加重了经济下滑趋势。

更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的银行尤其是那些接受政府援助的银行退出了欠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和企业发展的借贷业务，包括通过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进行的借贷。这样，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即使那些像墨西哥一样已经按IMF的要求作“对”了每件事的国家，肯定都将面临黯淡的发展前景。这是对完

<sup>①</sup> Gustavo Vargas Sanchez, *Análisis Económico de un Sexenio que Está por Concluir*, primera edición, Editorial Castdel S. A. de C. V., 2006, p. 103.

<sup>②</sup> Alicia Girón González, Noemi Levy Orlik, *México: Los Bancos que Perdimos*,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Facultad de Economía, UNAM, México, 2005, p. 41.

<sup>③</sup> Alejandro Alvarez Béjar, *La Inestabilidad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y Sus Implicaciones en México, Globalización Financiera e Integración Monetaria*, Primera Edición, UNAM, México D. F., Enero de 2002, p. 111.

<sup>④</sup> “The Values behind Market Capitalism”,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 January 2009.

<sup>⑤</sup>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载《求是》，2005年第3期。

全遵照该组织所有要求进行改革的墨西哥政府的第二项批评。<sup>①</sup>

第三，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保守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是，无论布什政府还是在奥巴马新政府内部都没有人敢试图为美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展开辩护。2009年初，大部分美国金融界精英由于处境尴尬都没有到达沃斯论坛中为其倡导的金融全球化进行粉饰。

欧盟的领导者们则开始论证“社会市场经济”，那将是欧盟国家未来采用的市场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有限的、全球化有限的、提供政府保护的“修正主义”，其调节机制在于，随着经济低迷恶化，政府增加支出，从而为阻止经济衰退提供保障。笔者认为，该市场模式将回归被西方正统经济学批判了30年的凯恩斯主义，是对墨西哥近4届政府彻底否定自己的“发展主义”模式，转而严格执行货币主义改革，实行“去国家化”和“反公有制”的经济“稳定”政策的第三项批评。<sup>②</sup>

第四，这轮深刻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了有关“全球化”的根本问题。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取得了对话语权的绝对话语权，“全球化”一直被国际政治经济精英们认为是一剂包治任何经济危机的“万能药”。但这剂药反而使得美国的金融危机蔓延全世界。

2009年初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都有这样一种忧虑：全球各国将陆续退出有严重缺陷的美式全球化进程，各国都将损失严重，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最值得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反思的是，他们本国的幼稚行业如何与美国政府大力补贴和担保的行业进行竞争？由此产生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从此以后，哪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够再使用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概念来说服其国民进一步向获得政府高额补贴的美国银行、投行和跨国企业开放市场？这是对近20余年来热烈拥抱自由化、投身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墨西哥政府的第四项批评。

最严重的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率先重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G20呼吁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来应对危机，但就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开幕的同时，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议案，要求经济刺激方案下必须使用美国钢铁。这表明，美国决策者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已经开始了，欧盟主要国家也会追随其后。

在全球化浪潮中，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领导了世界。当美式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陷入深刻危机之时，美国是否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蹈大萧条时代的保护主义路线，领导世界重新进入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对盲目崇拜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倡导的金融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抛弃，很值得那些认为“金融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国际接轨”就是解决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万能解药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深思<sup>③</sup>。

#### 主要参考文献

1. Alejandro Alvarez Béjar, *La Inestabilidad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y Sus Implicaciones en México, Globalización Financiera e Integración Monetaria*, Primera Edición, UNAM, México, Enero de 2002.
2. Alicia Girón González, Noemi Levy Orlik, *México: Los Bancos que Perdimos*,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Facultad de Economía, UNAM, México, 2005.
3. Ian Vásquez, “The Brady Plan and Market-based Solution to Debt Crisis”, in *Cato Journal*, Vol. 16, No. 2, Fall 1996.
4. Armando Labra Manjarrez, Héctor Ramírez Del Razo, “Diez Mitos No Generales sobre el Fobaproa, en la Problemática Financiera, la Banca Central y la Protección del Ahorro Bancario”, en *Cuadernos de la AMEP*, No. 4, 1999.
5. Nora Lustig, “Los Estados Unidos al Rescate: La Asistencia Financiera a México en 1982 y 1995”, en *Revista de CEPAL*, No. 61, Abril de 1997.
6. Jaime Ros, Nora Lustig, “Trade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with Volatile Capital Inflows: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Social Impacts in México during the 1990s”,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New School University, *SCEPA Working Paper Series I*, No. 18, February 2000.
7. Gustavo Vargas Sanchez, *Análisis Económico de un Sexenio que Está por Concluir*, Primera Edición, Editorial Castedel S. A. de C. V., 2006.

(责任编辑 刘维广)

<sup>①</sup> “The New Boundaries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Death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 January 2009.

<sup>②</sup> “The Return of State Power”,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 January 2009.

<sup>③</sup> Klaus Schwab, “Outcomes from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 January 2009.